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被曲解了的 古史地

曲辰 孙远志◎著

人民日報學術文庫

被曲解了的 古史地

曲辰 孙远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曲解了的古史地 / 曲辰, 孙远志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15 - 3523 - 8

I . ①被… II . ①曲… ②孙… III . ①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 IV . ①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3242 号

书 名: 被曲解了的古史地

著 者: 曲 辰 孙远志

出 版 人: 董 伟

责 任 编辑: 曹 腾 高 亮

封 面 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33

发 行 热 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 购 热 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 辑 热 线: (010) 65369523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3523 - 8

定 价: 7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	---

被曲解了的古史事

太昊非“伏羲”	7
炎帝非“神农”	13
“有熊国”就是“青丘国”	18
“炎帝八代”说的荒谬性	23
“黄炎”之称如何变“炎黄”	33
黄帝战蚩尤是平息叛乱	39
黄帝战炎帝是制止分裂	43
黄帝崇龙不拜龟	47
黄帝有“云瑞”的历史秘密	62
“蚩尤作云雾”是歪载史事	67
“阪泉氏”非指蚩尤	69
国家始祖不是按血缘	73
“炎黄子孙”的提法错误	78
蚩尤非炎帝后裔	80
蚩尤非苗族先祖	85
蚩尤如何能变成“文明始祖”？	92
几种“五帝”误说的由来	95

“五帝三王”与“三皇五帝”	100
少昊氏根本未称帝	106
九黎如何变三苗	112
《易》经重卦者不是周文王	116
“河图”“洛书”与《易》经无关	120
黄帝所“合”之“符”为兵符	131
舜为黄帝后代无可疑	134
“骊山老母”的原型	143
“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是秦始皇”说法错误	146

被曲解了的古遗址

黄帝的出生地不在新郑	151
关于“桥山”的笔移史	168
“空桑”山名变邑名	194
空桑缘何又变“穷桑”？	197
冀地原本不称“州”	198
阪泉地理位置记载正误辨	201
搞宣传为什么非要合并两个泉？	208
释历山为“釜山”荒唐可笑	213
全国众多历山的正误辨	217
还要制造出多少“蚩尤坟”？	226
“妫汭”非水亦非泉	238

被曲解了的古地名

解“中庸”释“中国”	243
古涿鹿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250
鸡鸣山原非“磨笄”处	256
灤泽之载变“雷泽”	260
“潢阳”原本是“黄河”	272
黄河山不是“燕然山”	274

附会黄阳错更名	
——黄阳山更名纪实	277
“唐太宗命名鸡鸣山”是讹传	280
清夷水如何变成了“妫水河”？	283
尧舜都实际在潘城	286
为什么中国到处有“灵山”？	290
燕京戎与先燕无涉	293
“姬水”、“姜水”乃附会	296
后记	304

绪 论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它使我们知道自己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从哪里来，走过什么样的路，要到哪里去，路该如何走。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

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国家设立史官及其制度，忠实纪录史事档案，随着朝代更替而撰写史书；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以达到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以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有着鲜明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国史之记述，亦影响到地方志书的产生。地方志书之撰，至少在西周时代已

有,或者还要更早一些,《山海经》就具有一定地方志性质。到了汉代以来,历代文人学者中,就不乏有志于方志之类书籍的撰写者。如:汉代朱赣的《地理书》,应劭的《十三州记》;《晋太康三年地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阚骃的《十三州记》;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隋虞世基的《隋区域图志》;唐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南朝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等。元、明、清,仿照国史分门别类的地方官修志书也发展起来,省一级的叫“通志”,县一级的称“县志”,各大名山有“山志”,河流有“水志”,寺庙也有其“志”,如《清凉山志》、《灵隐寺志》等。

这些地方志书,对各地的山川、河流、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土特产品、历史人物、地方官政绩等,都有丰富的记载,它不仅是研究各个不同地方历史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性资料。详细研究地方志书,常常可以解开正史某些谜题,纠正某些正史之误,是正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补充材料。

正因为史志文化的重要,而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这,是总结中国历史经验而发出的金石之音,是客观存在着的真理。日本欲行侵华,其御用学者就打着进行古史研究的幌子,先毁我华夏民族之古史,说“黄帝无其人,无其事;尧是香炉,舜是蜡烛台,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毁坏历史,其目的就是让人失去对历史的记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欲摧毁人们对往昔的记忆时,举过一个不论“是”与“非”,一定要全部销毁图书馆藏书的例子: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使叙利亚国运中断了一千多年之后才得以重建其统一的国家。当哈里发的军队攻下亚历山大港时,一位将官向哈里发请示如何处理亚历山大港著名图书馆的藏书问题。哈里发指示道:“如果这些希腊文书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它们就是无用的,犯不着保存;如果不符上帝的圣经,那就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销毁。”^②

属于敌对者摧毁史志,人们有能看清者,然杜撰历史,篡改历史,附会史事与地名,事实上亦同样是破坏真实的历史传播与民族精神之传承,是对史志文化的一种反动。而人们对此能看清者却少,反对者更少,批判者很难见到,倒是对其传播乃至赞赏者众。

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②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册第349~350页。

地方史志的编撰,多是由当地官吏组织当地的文人们进行,由于编撰者学识参差不齐,知识面有限,因而曲解、附会历史者多有存在;由于其不具备史学家心胸,又由于在偏爱于自己家乡的情感下忽略了志书对国史、对民族的影响,又往往会发生将重大而美好的历史事件发生地附会于本地,甚至明知其谬,而偏要重复其说,以“坐实”其事。涿鹿县的志书附会东汉窦宪刻石纪功的燕然山为当地的黄阳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史事的发生必然与一定的地点、地名、地理形势、交通要道等等有联系,当着一些重大历史遗址、遗迹能够利用来发展旅游事业,能变成滚滚而来金钱的资源后,一些地方官们组织人马编造和附会重大历史遗址、遗迹的事,就会司空见惯。于是,一些旅游部门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历史学家”“文化学者”!而忙于经济建设的人们,对此亦难以引起警觉,对于这种行为给国家和民族将要造成危害普遍认识不足,不能对于歪曲、附会和编造历史,以及制造假遗址的行为,给予有力的制止和纠正。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此喊上一嗓子。由此,想就歪曲、篡改、编造虚假历史、历史遗址、历史地名的事写一本书,书名就定为《被曲解了的古史地》。由于种种原因,此书难免有不如人愿之处,对此,一请读者理解,二请多提宝贵意见,万一我还能争取到改正的时间,我就一定将不妥之处改正过来!

曲辰

2015年6月21日于张市陋室



被曲解了的古史事

太昊非“伏牺”

“太昊伏牺氏”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无人质疑。然而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荒唐名称——将上古时代的一个地望之称与历史分期名称“合二为一”，理解为上古的“帝王”名称，如此不合乎逻辑的称呼，难道还不够荒唐么？因此，笔者就此进行一点辨析。

一、“太昊”是一个上古地望名称

“太昊”，在古籍中书作“太皞”“太皞”“太皞”“太皓”等。“太”，古同“大”，“太”为“极”之义。“皞”，谓天空“洁白光明之貌”^①，故“春为苍天，夏为昊天”^②。在古代，书写为“皞”或“皞”，是从“日”而不从“白”的。“太昊”与“少昊”，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两个地望名称，据现存古籍记载，在有熊部落方国之际，称现在的山东北部靠近渤海湾地方曰“少昊”，相当于今河南省的地方为“太昊”。这是因为，古有熊国的都城是“青丘”，地处冀西北桑干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之中。日出东方，天空稍有明亮，故称东方为“少昊”，其地望泛指今山东北部地方；日至中午，是天空中最为明亮之时，地处北纬40度线北的青丘，即使是盛夏，亦同样望日在南，故称南方为“太昊”，在地望上指相当于今河南省的地方。这种地望之称，在今人看起来觉得奇怪，然而在古人眼里，却是顺理成章。这是因为，古有熊国到了黄帝、炎帝共政之际，其地域也不过是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么一块地方。

对此地望之称，有不少证据可以证明：

(1)周成王复述古史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黄帝〕命赤帝分正〔副〕二卿，〔赤帝〕命蚩尤字于少昊。”

^① 《说文解字》。

^② 《尔雅·释天》。

炎帝命蚩尤到“少昊”司治，证明了“少昊”是地望之称而非人名；

(2) 蚩尤到了少昊之后，发动叛乱，战败被杀，黄帝又派青阳到少昊司治。故有的史书就称蚩尤、青阳都为“少昊氏”。如《竹书纪年》曰：“少昊氏……或曰名清[青]，不居帝位”。又《盐铁论·结和》篇云：“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我们必须指出，《盐铁论》之述有严重错误——涿鹿之战为两大战役：一为战蚩尤于涿鹿之野，一为战炎帝于阪泉之野。蚩尤战败，于逃途中落马被杀，是为历史事实；战炎帝是炎帝趁黄帝战蚩尤刚结束的疲惫之际向黄帝发难，然则三战决定炎帝败局，由此而造成黄、炎弟兄长期不睦。但黄帝一统中华之后，还是照旧让炎帝重新主政于南方，并未杀掉自己的弟弟。言“杀两皞”这种严重的错误，是由于误解《周书·史记解》“亡”字原意而造成的。《周书·史记解》言炎帝“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此“亡”字之用，同前文“夏后氏以亡”、“殷商以亡”、“有虞氏以亡”一样，是指亡其政治地位，而非指亡其性命。因而“杀两皞”就存有述史不实的重大错误。再者，既已言“杀两皞”，复又言“蚩尤”，则变二为三，又是一错。自古，凡议论时事而举古史事为例者，多有去史实远与严重失实的问题。即使如此，也同样还是说明了“太昊”、“少昊”原为地望之称，与“伏牺”无关。

二、“伏牺”是史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名

“伏牺”是史前史的一个时代划分名称。中国古籍在记载上古人名、地名、时代名等方面，多有以音而记、书写不同的问题，“伏牺”这一名称自然也不例外：《管子》一书记为“虧羲”；《淮南子》则作“虧戏”；《庄子》、《荀子》都记为“伏戏”；《汉书·古今人表》则记为“宓羲”；《易坤灵图》、《易通卦验》都书为“宓牺”；《河图》、《礼含文嘉》、《春秋内事》、《孝经援神契》、《遁甲开山图》等书，都以“伏牺”而行记载；《竹书纪年前编》以“庖羲”而为补；而《诗含神雾》、《补史记·三皇本纪》却又以“庖牺”为称……

依据我的研究，众多名称之中，实则都是“伏牺”和“庖牺”两个名称以音而记造成的不同书写差别。所以，《周易·系辞》中的“包”应作“庖”。两种写法不同的名称，其名义则又是一个发展畜牧业生产：伏者，驯服之谓。牺者，牺牲之称。

“伏牺”一称的含义，即驯服野生禽兽而为人工饲养，待到渔猎无获之时，再杀掉这些牲品种以供人们食用度日；“庖牺”之称的含义与“伏牺”相同：“养牺牲以

庖厨，故曰‘庖牺氏’。”①

由于自汉代以来，不少人将“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这些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历史所命的不同时代名称时，都当作了历史人名，且编造了不少神话相附会，造成了很大的历史混乱，对此，我们就需要稍作一点分析：

(1) 文字产生与使用的限制。

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有在有了文字这种记录语言的传播载体以后，才会有真实的记载和流传。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国的文字产生，是在新石器时代。按过去的考古发现，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不少古遗址，发现了文字性刻画符号。其中，有些与甲骨文完全相同或近似，对此，郭沫若曾经比较谨慎地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文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应用碳十四测定的四个数据，距今都在六千年左右。

但是，文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产生并使用，它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特别是没有像国家那样的机构去对民间零散性文字创造进行搜集、整理，作统一性的规范，尔后以行政措施在较大地域进行推广使用，是不会具备述史记事、有历史性传承功能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使有了文字，由于还未统一，那么用某种文字记载的事，在当时，因文字不统一就难以广泛流传。在其后，文字的统一使用，就会实际形成后世不识早已死亡了的文字而难以传其事的情况。现在，伴随着考古发现的文字性材料增多，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环，然脉络趋向比较明朗，史学家们认为，史载黄帝命史官仓颉造字，其所反映的，或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字搜集、整理，以及作统一性的规范、增创新字事件。依据黄帝以来史事记述较详细、而此前历史情况模糊的历史体现，也印证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此，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伏牺氏”，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名，而是历史时代名称。

(2) 古史料行文表述中的体现。

依现存古史料看，古人追述史前史，确实是作了一定的历史分期的。这些历史时期依次为：“兽处群居”时期、“有巢氏”时期、“燧人氏”时期、“伏牺氏”时期、“神农氏”时期。

“兽处群居”时期，是指人猿初分之际的历史时期。其时之人除了两腿能够直立行走，以便腾出前肢进行劳动之外，其它方面还同猿、猩猩、猴子等灵长类动物差别不大，也还是同其它动物一样，过着兽处群居式的最原始野外生活。如《管

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子·君臣》是这样说的：“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

“有巢氏”时期，是依据人们已经懂得了夏天居于树木之上，冬天住在山洞之内，以应寒暑之变，以避毒蛇、猛兽之害的历史特点而命称。《庄子·盗跖》言：“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八》引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

“燧人氏”时期是继“有巢氏”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特点就是发明了人工取火。中国历史上发明人工取火的方法，与澳大利亚人是有着不同特点的：澳大利亚人是“钻木取火”法；中国历史上，则是由打造燧质石器时引发枯草之类易燃物着火而受到启示，由此而形成的取火方法，应称之为“击燧取火”。东汉章帝曾于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集一批学者，引古史以议《五经》同异。后命班固集其中四十四篇为书，定名《白虎通义》。此后，其中的《议奏》、《通德论》两部分相继亡佚，故至晋代便称《白虎通》。其中也说到了“燧人氏”历史时期的情况：“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古史考》云：“古之初，人允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伏羲氏”时期是指饲养畜禽时期。中国原始社会发明人工取火，现在考古研究证明其开始的时间极早，其主要原因是进入狩猎生产的时间极早。狩猎生产需要用大量石质坚硬、刃缘锋利的小型切割器、刮削器等，这就是形成以桑干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小石器、石叶细石器文化系统的历史原因。但是，即使自然资源再丰富，处于狩猎经济生产时期的人类，也是避免不了要受饿的。因为，总会有因自然条件变化、天气变化而无猎物的时候。特别是还有炎热的季节，无猎物时要挨饿，猎物多了，也会因不能长时间保存而腐臭。当人们发明了以网罟捕捉活兽并进行人工饲养之后，就解决了这一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如此，当无猎物之时，就可以杀一些牺牲品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了。人工饲养禽兽的生产活动扩大，必然要造成饲料的来源短缺。当人们试着以人工种植饲草以解决饲料短缺问题后，也就为日后的进入农耕经济生产时代奠定了基础。因为人工种植饲草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从野生植物中培育、驯化、筛选农作物品种的过程。像神话中说的有什么“神鸟”叼来谷穗让人种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尸子》曰：“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始画八卦，列八节而化天下。”《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

礼。”按《春秋文耀钩》说，伏牺以下至神农七十二世。

“神农氏”时期，是由畜牧渔猎生产转入农耕经济生产至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周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

上述历史记述，都说明：兽处群居、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都是历史时代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历史记述之中多有推测之词，就是无确载可稽而造成的。古代学者也只能作一个大概性的推测。

(3) 伏牺氏时期距今的年代下限

伏牺氏时期，也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包牺氏”时期，其年代下限距今有多久？这在过去确实很难说，但现在，我们依据历史记载，结合考古研究的成果，虽说不可能做到准确，然大致上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估量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有了结果，夏朝初年为公元前 2070 年，由此而言黄帝肇造国家之制，至今约为 4700 年；神农氏七十世，每一世按 30 年计，约为 2000 多年。我们据此可以认为，伏牺氏历史时期的下限，距今约有七八千年。

从现在的考古学研究上说，以桑干河流域为中心的典型细石器存在于距今三万年至一万余年之间，这可以视作伏牺氏历史时期；河北阳原于家沟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发现的古陶片经测定为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全国到现在发现的距今一万余年的古陶片已有许多遗址；全国性考古证明，距今七八千年左右，中华大地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时期。这与古史料的记载大体上是相吻合的。

三、“太昊”与“伏牺”结合的演变历史

“太昊”这一地望名称与“伏牺”这一个历史分期名称的合并，并指为所谓“古帝名”，由来已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周初，其尾是在汉魏，按阶段分述如下：

(1) 西周“神道设教”造成了第一个历史谬误

早在商末，西伯就为其夺取天下搞“神道设教”愚民而治进行准备。一是改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做占卜用，这就是所谓“文王演《易》”的史事；二是著文训政以遗子孙，其文保存于《逸周书》之中；三是制定了一大套祭祀鬼神的制度，这就是《周礼》中所规定的内容。造成古地望名称为“古帝王”之谬，就源自一年依“四立”之期的郊祀制度之定。

在古代，国家祭典主要是祭祖，五年一祭的名曰“禘”，三年一祭的称曰“祫”，一年四季祭名曰“春祠”、“夏祫”、“秋尝”、“冬烝”。此三种祭法多在明堂设牌位，